

“英国大选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 综述

黄 洋

2015年5月28日,由《欧洲研究》编辑部主办、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协办的“英国大选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会议邀请了商务部、外交部、中联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外交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内蒙古大学等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英国大选及未来政治走向”、“英国大选与英国经济的未来”、“英国大选及对外政策走向”、“英国社会文化及人文交流”四大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嘉宾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主编黄平主持了开幕式,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会长、中国前驻英大使马振岗先生作嘉宾致辞。黄平所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现阶段欧洲研究包括英国研究对研究者们提出了新要求,大国研究既

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需要应对性的建议和对策研究。对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可以相辅相成,并不矛盾。英国的实力虽已衰落,但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非常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

马大使在致辞中阐述并分析了英国大选的总体情况。他指出,保守党胜选主要有三个原因:执政期间良好的经济表现;对手工党的主张不为选民关注;在苏格兰议题上抓住民众对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结盟的担忧大做文章。大选后,卡梅伦处于有利地位,摆脱了联合执政的制约之后,其执政空间和条件将大大改善,可以放手做事;工党想恢复往日辉煌比较困难,米利班德辞职后,工党高层对参选领导人并不积极;苏格兰民族党虽获得巨大胜利,但因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对英国政治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同时,保守党政府也面临三大挑战:即能否保持住现在英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苏格兰问题、能否处理好英国与欧

洲的关系。在中英关系方面,马大使认为,保守党单独执政对中英关系是有利的,其注重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态度可以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英国大选及未来政治走向

中联部七局英国北欧处处长叶国玲认为,本次大选反映出英国政党政治的五大特点。第一,选前各种预测纷纷失灵,凸显英国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第二,保守党和工党的力量对比继续失衡,右强左弱更加明显。保守党力量得到巩固,成为1983年以来首个议席增加的执政党;工党继续呈现颓势,传统票仓苏格兰只剩一席;第三,苏格兰民族党强势崛起,夺走自民党传统第三大党的位置;第四,英国选举中得票率与议席数不对应的问题仍然突出;第五,女性议员显著增加,首次出现华人下议员。出现上述特点的原因是:英国经济发展向好;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社会趋向保守,出现“脱欧”、“反对移民”等思潮;工党先前执政失误,其能力仍然受到质疑,在野几年来的左倾政策与社会右倾趋势不符;苏格兰民族党凭借民族主义思潮快速发展壮大,而自民党在联合执政期间背离了传统价值观和2010年竞选承诺,失去选民信任。从未来趋势看,形势对保守党有利,工党重新崛起仍需时日,而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会导致英国权力的进一步分散化。她提出,中国需要加强与新生代议员的接触,继续促进中英政党对话,加强中英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交流。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

员、世界政党研究处处长林德山提出了英国政党政治的三大问题:工党失利是否成为常态?保守党执政是否出现一定的稳定性?大党在削弱,小党在增强,是常态还是暂时性的现象?他认为,首先,从布莱尔到布朗,工党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采取了新中间战略,改变了传统依托工会的特点。这一变化虽然赢得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但中间选民同时也具有流动性,而工党对撒切尔主义的继承又埋下了经济危机的伏笔;其次,卡梅伦结束了保守主义的混乱,重新回到一个传统保守党的定位;再次,此次大选使英国政治又回归到两党制的常态。苏格兰作为地区性政党,与自民党还存在差别。英国独立党在大选中仅获得一席,不过一旦英格兰地区也实行权力下放,英国独立党则很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则认为,英国目前出现权力空心化的特点,即向上交权(欧盟)、向下流失(权力下放)。同时,政府呈现公司化趋势。若权力继续下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将成为分工关系而不是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权力流失始于撒切尔时代开始的税法改革和私有化,政治上的权力流失始于布莱尔的权力下放。到了卡梅伦时代,权力分散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英国的权力分散服从于是否有效的原则,而不是传统的政治权威的神圣性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田德文研究员提出,人们可能低估了新工党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作用和影响。因为“改

良”和“变革”因素的存在,社会民主主义是具有进步性的。至于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表现,他认为,工党的失利主要输在苏格兰问题。工党的分权下放在苏格兰可以说达到了目标,但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工党在竞选活动中主攻工薪阶层,反映出其意识形态的贫乏。新工党针对新问题的改革对中国也有启示意义。中国学者应当思考如何使具有全球性的资本和具有国家性的社会重新建立起联系,推动市场经济更加合理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英国研究中心主任及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教授对“全民国家”政党这一理念进行了回顾和展望。王展鹏教授指出,大选获胜后卡梅伦提出的“全民国家”政党理念其实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保守党前首相迪斯累利。战后“全民国家”政党理念成为英国共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开始背离这一传统。近年来,工党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再探索,但前领导人米利班德进行的“全民国家”政党实验效果有限,“全民国家”政党理念也已淡出工党主流话语。目前,卡梅伦领导下的保守党也在进行“全民国家”政党实验,同样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李靖堃阐述了权力下放进程对英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在介绍了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区别后,她指出,英国政治体制中的联邦制因素正在加强,英国政治体制已处于介于联邦制

与单一制之间的一个位置,会不会继续向联邦制发展还有待观察。此外,权力分配模式是否会更加不均衡、比例代表制是否将普遍适用、全民公投是否会影响到议会主权原则、是否会颁布成文宪法、苏格兰是否会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以及全球化、地区一体化与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是否存在悖论,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助理研究员李冠杰主要介绍了英国大选与主要政党的权力下放思想。首先,他回顾了英国权力下放的进程,并概述了大选中工党、自由民主党、保守党、英国独立党对于权力下放的设想。他认为,目前大党推动下放的力量不足,地区政党推动下放的能力有限,权力下放已到顶峰,权力下放面临向更低层次下放的挑战。就未来几年英国政治发展而言,苏格兰独立公投否决独立后,国内政治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未来几年英国在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会逐步回归到国际政治舞台上;苏格兰民族党争夺权力的舞台移至威斯敏斯特议会;威尔士民族党会逐渐崛起;北爱尔兰仍是权力制衡的格局;英格兰人的民族意识得以提升。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哲社学院副院长宋全成教授介绍了21世纪以来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他指出,21世纪的英国华人的政治参选进程,具体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2000-2009年,是英国华人政治参选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英国华人从“沉默一族”转变为积极参选地方议会议员并取得较多成功;2009-2015年,英国华人参政从竞选地区议会议员到竞选下议院

议员的阶段。2010年英国下院议员的选举中,总共有8位华裔政党候选人参加了英国下院议员的竞选,创下了华人竞选下院议员的历史纪录。但由于多种原因,参选的华裔候选人全部败北。在2015年5月举行的英国下议院议员选举中,共有11位华裔候选人角逐国会议员,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一位成功当选,成为英国华人参政历史上的里程碑。21世纪以来的英国华人参政具有如下显著特征:第一,具有鲜明的英国出生的二代华人(BBC)高素质特征;第二,华裔候选人已成为英国主要政党的重要精英阶层的组成部分;第三,与华人参政组织——“华人参政计划”及其有效的政治互动紧密相关。就其前景而言,英国华人参政的热情将持续高涨;英国下议院中必将涌现出更多的华人政治家;英国华人欲取得美国华人在政坛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英国大选与英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分析了英国大选中的经济因素。他认为,英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在于表现良好的消费和投资,而出口表现一般。英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最有特点的措施是低利率政策。此外,英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英国目前就业形势良好,学徒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存在是否陷入通货紧缩的争议。虽然财政形势好转,但赤字仍然高达5%,税收也缺乏增长,军费的削减已经使英国军

队战斗力下降20%。紧缩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复苏也仍然存在争议。贸易逆差较大,因为经济复苏过于依赖消费,出口贸易对经济复苏贡献不大。同时,英国经济仍面临一个老大难问题,即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商务部政研室处长何亚东认为,英国特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金融危机中英国在七国集团中表现最差,因为英国经济政策就是围绕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展开的。近来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英国较强的改革力度。卡梅伦政府采取了“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努力吸引外资,学徒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的科技创新实力仍然较强,但产业化能力比美国差很多,不过这两年已开始弥补这一短板,特别是提出英国创新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结合起来;英国对外政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英国保留了独立的货币和货币政策,没有加入欧元区。欧债危机爆发后,英国更加坚定了保留英镑的决心。英国可能不会脱离欧盟,但会借此谋取在欧盟内的更多利益;中国因素也是英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方面。英国政府重视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的作用,尤其是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带动了旅游业、房地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英国新政府应该会延续积极的对华政策。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柯从投资与金融合作方面对中英关系进行了展望。他指出,2011年中国是世界第六大投资国,2012年成为第三大投资国,到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外国对中国投资,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与此同时,

紧缩背景下的英国也迫切需要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对英投资已经超过英国对中投资。中国对英投资是稳固中英关系的重要方面。对外投资意味着两个社会之间的交汇。金融如同血液,如果两国的金融关系紧密,那么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也会紧密,如美欧互为最大的投资国和来源地,美欧因而拥有“骨肉关系”。英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同时需要一个欧洲内部的关键伙伴。从这一角度来说,中英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杨芳分析了英国大选与英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她认为,经济上的成功是保守党胜选的主要原因。卡梅伦竞选的主要策略就是主打“经济牌”,而工党经济政策,如增税、干预银行业,拆分传媒巨头等遭到了多方抵制。卡梅伦经济上是撒切尔夫人的传人,但也重视社会的作用。大选后,英国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是:保障经济安全,减少赤字;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包括:劳动生产率复苏缓慢,赤字高企,通缩压力增大;中短期内,英欧关系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较大。杨芳副研究员预测,英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但仍会是G7中增长最快的欧盟经济体。

英国大选及对外政策走向

外交部欧洲司一秘周彦指出,近年来英国外交呈现收缩态势,主要表现为英国在全球事务中后退,在欧盟事务中受孤立,

以及英美特殊关系空心化。同时,对外交具有保障作用的军事和国防也呈收缩态势。尽管英国实力下降,“内倾”有所抬头,但现在下结论“英国已经沉沦”为时过早。首先,英国绝对实力不容小觑。它仍是世界上第六大、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拥有多种优势产业和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在联合国、北约、G20、英联邦等国际组织中拥有重要影响力,并且英国还拥有世界级的软实力;其次,英国拥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触角敏锐,善于把握机遇,积极与新兴市场发展关系;再次,英国具有保持世界大国的雄心。虽然在利益相关度不高的事务上不挑头,但仍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善于抓住某一具体议题发挥影响力。随着英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掣肘减少,可以预见下一个五年内英国外交将会更有作为,重点仍会是为英国经济发展赢得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重塑英欧关系,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价值观外交还会继续推行。不过,英国国力下滑的大趋势是必然的,它会努力保证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效果仍有待观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赵怀普从四个层面分析了卡梅伦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第一,在全球层面积极推动对外经贸发展,确保英国国家竞争力,继续进行“经济外交”。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应对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是当今世界头号议题。过去五年来,卡梅伦政府已经意识到英国的硬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英国的全球战略,有必要收敛国家力量,包括放弃虚幻的世界大国目标,集中资源进行经济建设,使经济利益最大化、确保国家竞争力作

为国家外交优先目标。这一政策已收到不错的效果,应该会持续下去;第二,加强对新兴国家外交,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争取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保证英国适当的国际影响力。英国需要在不同的领域物色不同的外交伙伴,英国在亚洲不可能主打“军事牌”,只能专攻经济。通过军事上加强与美国联系,经济上与中印加强联系,英国才能保证在亚洲乃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第三,英美关系仍然十分重要,但不会完全步调一致。美国也意识到了美英外交需求的差异,双方关系会变得更加务实。在有共同利益的国际事务上,英美会保证同步和协调,在其他事务上会适当拉开距离,但是保持交流和沟通;第四,英国同欧盟的关系会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有理即基于利益英国必然要求通过谈判推动欧盟改革;有利即保守党刚刚获胜,国内支持率较高,同时德法也希望英国留下;有节即如果卡梅伦政府的意图并不是想让英国真正退出欧盟,则必须在对欧谈判中保持克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曲兵认为,尽管最近国际上对英国外交上的批评较多,认为英国正在从国际事务上退缩,英美特殊关系走向终结等,但英国官方话语并不承认英国放弃了大国地位。这可能更是一种政策宣示,未必是政府内部的真实看法,外交在英国大选中确实也不是主要议题。英国的对外政策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第一,经济实力。如果英国经济持续发展,实力稳步增长,对外政策可能会更加积极,但可能仍需要四、五年

的时间;第二,历史因素。伊拉克战争后遗症没有消失,民众厌战情绪仍然存在,英国对外干涉会更加慎重。卡梅伦更加重视经济,对外干预热情不如布莱尔,不会通过展示外交能力来赢得选举;第三,政治精英价值观。目前保守党成员几乎全是疑欧派,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第四,重大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如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苏格兰公投等等。就脱欧公投而言,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对欧谈判将会给卡梅伦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总体而言,英国会变得更加“内向”,因下放权力、宪政改革等国内议题费时费力,但它也不会立刻从国际舞台完全撤退,不过介入国际事务的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未来英美关系的重点可能会放在安全而不是经济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晨从利益共同体方面对中英关系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中英关系具有三点特殊性:第一,中英两国经贸互补性强。中国为制造业大国,英国为服务业大国;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服务业的大发展,也给英国带来更大的商机;第二,中英在全球化中均抱有开放的思维,愿以开放应对经济下行风险。自2000年以来,英国一直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过去几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对英投资的井喷期,并且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很少受到政治性的干扰;第三,中英均为世界大国,拥有广阔的世界视野。英国对于世界格局转变的趋势,对于新兴国家实力上升具有清醒的认识。英国务实和理性的态度可以为中英利

益共同体建设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张蓓指出,首先,对英国在世界上角色的定位已基本形成共识,英国两党对英国在世界上角色的定位中再也找不到“世界领导者”这样的话语。其次,英国外交仍然是坚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融合,但是行动上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英国有坚持所谓道义外交的传统,这一点被新工党做到了极致,而以卡梅伦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吸取了教训,进行了重要的外交调整,变得更务实、更重视经济利益,但他们也无法抵挡道德外交的吸引力。卡梅伦仍强调英国外交要体现英国价值,事实上同道德外交的内涵没有区别。卡梅伦政府坚持占 GDP 0.7% 的对外援助,发布人权报告,支持人道主义干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英国在这方面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一是价值和利益是否总是存在一致性尚存疑问;二是英国在价值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选择利益。例如英国对利比亚援助很多,但迫于国内反移民的压力只接受了很少的难民;英国把中东国家作为武器出口的优先地区,如 2011 年镇压巴林动乱的武器多数来自英国,这同英国标榜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随着英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软硬实力的下降,未来英国外交中出现的价值和利益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突出。

英国社会文化及人文交流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欧洲处处长杨晓春在会上介绍了中英人文交流的情况。

中俄、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已经建立数年,人文交流已同政治安全、经贸关系一起形成了双边关系的三大支柱。世界多极化的形势要求我们建立更加平衡的人文交流机制体系,2012 年中国启动了中-欧盟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同时也重视与欧盟重要成员国加强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工作,2012 年启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4 年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德在政府磋商的框架下进一步加强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两国人文交流。根据 2011 年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 2012 年启动之初确定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青年、体育和传媒等领域开展交流,2014 年机制第二次会议时将卫生纳入交流领域,在机制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如普通民众的参与远远不足、资源不足、人力不足等。未来中英人文交流机制的工作包括:做好顶层设计,既要涵盖政府层面,也要包括地方和普通民众的参与,将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交流带动起来;确立总体目标,在项目方面更加体现中外双方的关切和实质性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人文交流基金”,开发人文交流资源,汇集人文交流的信息;要跟踪督促确定项目的落实;建立年报简报制度等,提高人文交流的显示度和影响。欢迎专家和各界关注中外人文交流,提出建议和积极参与。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欧洲学会欧盟研究会理事于文杰作了题为“大宪章与英国政治文明的书写方式——与英国

史学家对话”的发言。他指出,《大宪章》是英国宪政史上极为重要的法律文件。今年是英国《大宪章》签署 800 周年,中英两国历史学家就《大宪章》及英国文明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于文杰教授认为,我们应在协同国内外专家对相关学术经典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属于中国学人自己的英国文明研究的学术视角与书写方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石同云介绍了英国电影产业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她回顾了新千年以来英国电影产业取得的不俗成绩,指出这些成绩源于对民族特色题材的继承和发掘,也得益于以国际化资金(主要是美国)及运作为后盾。石教授从生产发行、产业链、政府扶持、国际化、题材、独立电影等方面介绍了英国电影产业的特征,并重点指出近年来英中电影交流实现了空前的快速增长。最后,石同云教授总结了英国电影产业对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多方面启示。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丹林教授分析了英国大选对英国报刊业监管改革的影响。她指出,英国报刊业监管从 2011 年 7 月的“窃听丑闻”曝光开始,到现在尚未尘埃落定,仍处于僵局状态,具体表现为旧的监管机构 PCC 已停止运作,新的机构 IPSO、IMPRESS 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对大选结果有较大影响力的《太阳报》在此次大选中支持保守党,因为如果工党取胜,或许会重新选择成文立法以进行监管的方式,这是报刊业不愿意看到的。相比之下,卡梅伦则提出用“皇家宪

章”取代成文立法的形式。未来保守党政政府可能会维持现状,或采取某种方式促使 IPSO 寻求督察委员会的许可,也有可能再启动新的调查,重新探讨报刊监管制度的法律基础问题。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张晓路探讨了苏格兰民族党的福利政策。她指出,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独立白皮书中提出的诸多福利政策,如取消卧室税、幼儿看护、高等教育免费等,要么效果有限,要么宣传效应大于实际应用,要么重复英国政府已有的政策。苏格兰独立后将会面临经济社会上的风险:第一,人口老龄化,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对移民吸引力不足,抚养比增高,人力成本升高,对国家财政是个很大负担;第二,苏格兰优势产业不多,主要依靠金融服务业等,一旦独立,自身产业分布不均衡,而依靠资源也有限;第三,北海油田估值尚有争议,且增产需要增加投入,也增加了成本。总而言之,苏格兰政府高估了自身经济实力,低估了经济风险,民众容易受民族主义宣传影响,难以理解强大主权国家的益处。

与会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还进行了相关讨论,由于时间所限,未能进一步展开。《欧洲研究》杂志将在下期的笔谈中对“英国大选及其影响”进行延展性讨论。

(作者简介:黄洋,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